

新史料发现 与“秦族东来说”的坐实*

王 洪 军

摘 要：秦之先祖是被周人迁徙至甘陕一带的商盖（商奄）。商奄原系殷商故都，后成为商的“支子封国”，商奄之民属殷商族裔。商奄自称少皞氏之裔，嬴姓。秦人祭祀少皞氏，便是祭祀自己的始祖神。基于这种亲缘关系，商的重臣（即秦人先祖）蜚廉联合少皞氏之墟的徐、黄、江等嬴姓国与禄父数度叛周。践奄之后，周人将商奄故地及部分奄民分封给伯禽。奄君及部分子民被迁徙到齐国蒲姑，令齐国看管。恶来之子女防及部分奄民被远徙汧渭之间。周初先期抵达此地，为周人保西陲的中潏子孙即为出土文献所说的“秦夷”，后来的商奄之民被称为“戎秦人”，即清华简所谓“秦先人”。商奄后裔逐渐强大后，周孝王分割大骆嫡子封地与非子，嬴秦始为大夫、封诸侯，又益地千里并最终统一中国。

关键词：嬴秦 地望 族源 迁徙

作者王洪军，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哈尔滨 150025）。

经过 20 余代君主几百年的努力，秦人终于战胜众多诸侯国，建立起统一的帝国。然而，享国仅十余年，即被六国子遗推翻。有关秦国的许多历史问题由于记载严重缺失而晦暗难明，秦人族源等问题的研究也因此困难重重。就目前已掌握的传世材料而言，秦人“东夷说”、“西戎说”都缺乏有力证据，该问题研究已陷入停滞状态。清华简有关史料的发表，为秦人族源等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

一、商奄是“秦先人”的东夷地望

秦人远居西北，受恶劣环境及西戎民族影响，形成“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

* 本文系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讖纬与汉代诗学研究”（项目编号 11BZW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① 的独特生活习性；对于军功的过度追求，铸成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而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的行政体制，展现了有效操纵和灵活机动的政治文明。这成为自称华夏族，崇尚礼乐文化的周人政治集团排斥“夷狄”的理由。加之“尚武”的秦人并没有保留故祖历史文化传统的习惯，历史记载残缺不全，研究者只能通过真假杂糅的零星史料考辨是非。于是出现了以王国维等为代表的“西来说”与以卫聚贤等为代表的“东来说”。王国维认为“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殷之末，有中湣者，已居西垂。大骆非子以后，始有世系可纪，事迹亦较有据。”^②“西来说”并未探及族源，显得相当薄弱，难以为人信服。“东来说”得益于“玄鸟”神话的支撑，但由于西迁路线不明，因此也难成定论。清华简《系年》的发现，为“秦族东来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支撑，解决了秦人族源及礼俗等问题。

（一）商奄是嬴秦东夷的栖息地

清华简《系年》：“成王屎（继）伐商邑，杀案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虺之戎，是秦先人，世作周危（卫）。”^③是说原居东方的“商盖之民”即秦人祖先，他们由于随商王子武庚数次叛周，战败之后，被周人强行迁徙至宗周西部。

“商盖”一语，最早见于《墨子》、《韩非子》。《墨子·耕柱》：“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孙诒让注“毕（沅）云‘商盖即商奄。’……王（念孙）云‘商盖当为商奄。盖字古与盍通，盍奄草同。’”^④《说文》释“奄”：“覆也，大有余也。”段注“古奄、弇同用，覆、盖同义。”又释“郁”云：“大部曰‘奄，覆也’，《尔雅》‘弇，盖也’，故商奄亦呼商盖。”^⑤至此，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商盖”实为“商奄”的异写。《韩非子·说林》：“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⑥可见商盖在商末周初是一个实力颇强的诸侯国，周人轻易不能战胜。

商奄，《书序》称“奄”。“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

① 《战国策·魏策》，缪文远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72页。

② 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29页。

③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2），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页。

④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11《耕柱》，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61页。

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92、296—297页。

⑥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7《说林》，诸子集成本，第132页。

于蒲姑。”“成王归自奄。”^①关于成王伐奄，《尚书大传》记，武王死之后，“管叔疑周公，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②从伏生记述可知，奄君蒲姑散播流言致使周人内部失和。也有研究者据此将“奄君薄姑”理解为“奄国”国君“薄姑”，亦通。此说支持本文的论述，故不作展开。

《史记·周本纪》：“（周公）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集解》：“郑玄曰：‘奄国在淮夷之北。’”《正义》：“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③故奄国在鲁，这是传世文献比较一致的看法。《左传》昭公九年“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正义》引服虔语曰：“蒲姑、商奄，滨东海者也。蒲姑，齐也。商奄，鲁也。”^④《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在这里，商奄和奄，杜预认为是一国，而孔颖达则认为是二国。^⑤商奄近鲁，周公诛商奄之后分其遗民于鲁，即“封于少皞之虚”，这部分奄人又称鲁奄。梁益与孔氏持相同观点“奄、商奄二国名。商奄之君附纣子禄父，周公践祚，伐之。又有鲁奄之奄，然与禄父所封相远。”^⑥梁氏既取成说，又立新题，颇为缠杂。“奄、郟二字同时并行，今则奄行而郟废矣。单呼曰奄，紧呼曰商奄。”^⑦段玉裁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奄最早出现在《竹书纪年》，南庚“即位居庇，三年迁于奄”；阳甲“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盘庚“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作为殷商故都，奄被称作商奄是有文献依据的。王国维《北伯鼎跋》：“奄地在鲁……邾墉去殷虽稍远，然皆殷之故地。《大荒东经》言王亥托于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东都。自殷未有天下时，已入封域。又《尚书疏》及《史记索隐》皆引汲冢古文‘盘庚自奄迁于殷’，则奄又尝为殷都，故其后皆为大国。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⑧王氏认为，奄即商奄，为殷国故都，后变成商的诸侯国。李白凤认为“在《古本竹书纪年》有‘南庚迁奄，阳甲居之’的记载，唐兰认为这就是盘庚六迁中所失载的一迁，这很正确；但唐氏未说明为什么南庚要迁奄。我认为，从

- ①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7，《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27页下。
- ② 伏生《尚书大传》卷5，皮锡瑞疏证，光绪丙申师伏堂刻本，第2页a—3页b。
- ③ 《史记》卷4《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3页。
- ④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45，《十三经注疏》，第2056页下。
- ⑤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54，《十三经注疏》，第2134页下。
- ⑥ 梁益《诗传旁通》卷15，《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经部，第5册，第845页下。
- ⑦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96页下。
- ⑧ 王国维《北伯鼎跋》，《观堂集林》卷18，第885—886页。

这件事也可以由侧面证明东夷势力的消长；因为东夷或服或畔，所以南庚迁奄（故称商奄）。”^① 顾颉刚十分肯定地说“奄为商的旧都，其在商末，当为商王族的支子所封之国，故称之为‘奄侯’，又称之曰‘商奄’。”^② 徐中舒亦认为“奄在齐、鲁之间，为殷故都。”^③ 据以上诸学者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奄是殷人先祖迁徙的众多都城中的一个，商奄之民是殷人遗族；奄地在齐鲁之间。

盖，或作奄、商奄，在其他出土文献中也可印证。临沂汉简《孙臆兵法》云：“帝（商）奄反，故周公浅（践）之。”《禽殷》铭有“王伐盖侯，周公某（谋），禽（擒）祝……”^④ 等句。唐兰云“盖，国名，古书多作奄。盖、奄声近通用。《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均作商盖，《左传》昭公九年和定公四年则作商奄。那么‘王伐盖侯’即是《书序》所说成王践奄之事。奄在山东曲阜。”^⑤ 《左传》僖公四年云“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徐白凤认为“‘五侯’是薄姑、徐、奄、熊、盈，‘九伯’应是东夷九族，这从其地望可以得到证明的。”^⑥ 与《禽鼎》暗合，可备一说。《保卣》铭文“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国）五侯。”^⑦ 黄盛璋、郭沫若认为，“殷东国五侯”是指“殷东方的薄姑、徐、奄、熊、盈”。^⑧ 由此可知，奄国是商末周初的一个东方侯国。恰如顾颉刚所说，奄侯之国是殷王所封。武王伐殷时，奄侯臣服。武王崩，周公辅政成王，奄侯叛周，于是发生了《尚书》及《系年》所云践奄之事。

《说文》邑部“奄，周公所诛郟国，在鲁。”奄国在齐鲁，即今天的山东。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认为，奄在淮夷之北，鲁之正东，奄中、弇中、淹中是相通的，即南庚自庇所迁之奄。^⑨ 丁山在考察盘庚之前商人遗迹时采纳雷学淇观点，又申之曰“《汉志》又云‘洙水西北至盖，入泗水。’洙泗交会之处，在鲁国城东数十里。传说今曲阜县二里有奄里，为孔子故居。我认（为）南庚所居的奄，不在沂水西北，或在洙泗交会之处。鲁国城中有亳社，此亦商代故都之证。”^⑩

① 李白凤《奄族考》，《东夷杂考》，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70—71页。

② 顾颉刚《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一》，《文史》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页。

③ 徐中舒《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④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

⑤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页。

⑥ 李白凤《奄族考》，《东夷杂考》，第73页。

⑦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4卷，第159页。

⑧ 孙稚雏《保卣铭文汇释》，《古文字研究》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8页。

⑨ 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12，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165页。

⑩ 丁山《盘庚迁殷以前商族踪迹之追寻》，《商周史料考证》，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齐都临淄，其“西南有狭道名弇中”。^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闾邱婴、申鲜虞“行及弇中”、“行出弇中”；哀公十四年，子我“失道于弇中”，其所指之地一也。弇中是一条由齐国通往鲁国的狭窄山谷，所以杜预注为“狭道”。《春秋地理考实》谓“临淄县西南至古莱芜有长峪，界两山间，踰二百里，中通淄河。长峪本名马陔，亦名弇中马陔。”^②很明显，从居住环境看，这里的弇中不可能是殷商的故都，也不可能是商奄。丁山从水源角度追寻奄的方位，思路是正确的，奄应该在洙泗流域寻找。《左传》庄公九年冬，“浚洙”。杜注“洙水在鲁城北下合泗。”^③清人蒋廷锡谓“《史记》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筑古鲁城也。’曲阜县，今属山东兖州府。”^④古鲁城即曲阜，在洙泗交汇处。那么，不管是鲁国城东数十里，还是曲阜县东二里处，都应在商人先祖迁徙的奄的范围之内。“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公七年），春秋末期尚且如此，鲁建国之初的管辖范围应该不是很大。鲁之东郊门不开，系不堪东夷族的侵扰，或可证明商奄的一支部族就在曲阜之东。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⑤阎百诗《四书释地》曰“昌平本山乡，盖以山得名。《括地志》云‘在兖州泗水县南六十里，故邹城在泗水县东南六十里，故阙里又在县南五十里。此则以曲阜之阙里名其地，非真阙里也。真阙里，伍缉之曰‘背洙面泗’。”^⑥阙里“背洙面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考之《水经注》：“泗水又西南流，迳鲁县分为二流，水侧有一城，为二水之分会也，北为洙流。《春秋》庄公九年，经书‘冬，浚洙’。京相璠、服虔、杜预，并言：‘洙水在鲁城北，浚深之为齐备也。’南则泗水。夫子教于洙、泗之间，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领徒之所也。《从征记》曰：‘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阙里背洙面泗，南北百二十步，东西六十步，四门各有石阙，北门去洙水百步余。’”^⑦文献皆谓阙里在洙泗交汇处，其地便是孔子出生的奄里，广而称之为曲阜，即奄国故地。孔子本为商人后裔，其祖孔防叔选择商人故地为自己居住地，实际带有文化寻根的意味。

由此可知，商盖，或曰商奄，原本是商人迁居的都城之一，商奄之民是商族的

①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208《嘉礼》，《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0册，第220页下。

② 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2《襄公二十五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1册，第295页下。

③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8，《十三经注疏》，第1766页中。

④ 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阮元《皇清经解》卷207，咸丰庚申（1860）补刊本，第38页。

⑤ 《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1905页。

⑥ 阎若璩《四书释地》，阮元《皇清经解》卷20，第26页b。

⑦ 《水经注》卷25《泗水注》，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92页。

支族。商亡之后，商奄之民追随商王子武庚数度反抗宗周统治，给周人带来巨大威胁。经过连年征战，周人平定包括商奄在内的诸多嬴姓国和武庚叛乱，将商奄之民做如下分割：奄君被迁徙到齐国薄姑之地；一部分商奄之民分给鲁国，令鲁“怀柔之”；另一部分商奄之民被周人徙至甘陕一带，形成秦人祖先。

（二）薄姑是商奄支族的迁徙地

周人“践奄”后，“迁其君薄姑”。周初的薄姑之地是太公封地，《左传·昭公二十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爽鸠氏是少皞氏之司寇。季荝为虞夏诸侯，代爽鸠氏。逢伯陵为殷诸侯，姜姓。《汉书·地理志》：“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颜师古注“武王封太公于齐，初未得爽鸠之地，成王以益之也。”^①故《齐诗谱》曰“齐者，古少皞之世爽鸠氏之墟。”^②显然，太公所封齐地并不包括薄姑，周人平定四国叛乱后，奄君被迁徙到薄姑，薄姑才被益封给太公。商奄本是少皞氏族裔，所以，太公也就拥有了少皞氏之墟。

薄姑所在具体地理位置，《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诸侯，封于此，周灭之也。”《水经注·济水》曰“济水又经薄姑城北，《后汉郡国志》曰‘博昌县有薄姑城。’《地理书》曰‘吕尚封于齐郡薄姑。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史迁曰‘献公徙薄姑。’”^③《水经》郦注所引有误。《史记·齐太公世家》称，武王已封师尚父于营丘，都营丘。周夷王时，胡公徙都薄姑。薄姑在齐地并一度作为齐国都城存在，当无疑问。1929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鬲方鼎》铭文有“惟周公于征伐东夷，丰白、尊古咸斩”等文字，尊古即薄姑，这是有关薄姑的唯一金文资料，周公东征、讨伐薄姑即有了出土文献的证明。

徐中舒认为“东土之蒲姑，当跨有齐、鲁诸地。”“古时都邑虽有迁徙，而其名多从旧称。如：晋迁于新田，即名新田为绛，而以旧都为故绛；楚都丹阳，为今秭归，后徙枝江，亦名丹阳；楚武王都郢为今江陵，至昭王时，徙都于都，因谓江陵为纪郢，都为郢郢；此皆以其旧名，名其新邑也。《列女传》‘徐吾者，齐东海上贫妇人也’，齐有徐吾氏，足证齐、鲁之蒲姑即上党之蒲姑之东徙者。”^④诚为不易之论。

亳、薄古字通用，蒲、薄则一音之转。《左传》哀公四年“亳社灾”，《公羊

①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660 页。

②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 5，《十三经注疏》，第 348 页。

③ 《水经注》卷 8《济水注》，第 213 页。

④ 徐中舒《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大学学报》1998 年第 3 期。

传》则谓“蒲社灾”；《尚书》之蒲姑又作亳姑，史迁作薄姑。《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①《书序》：“汤始居亳，从先王居。”^②《逸周书·殷祝解》：“以簿之居，济民之贱，何必君更？”黄怀信说“簿，元刊本、程本、钟本、吴本、王本作‘薄’。”^③此薄即汤居之地，汤或称薄君。《尚书·立政》有“三亳”之称，孔疏引皇甫谧说，以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④傅斯年解释了多个亳地的问题“亳者乃商人最初之国号，国王易其居，而亳易其地，原来不是亳有好些个，乃是亳王好搬动。”傅氏认为：“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⑤其所论者，即有蒲姑。无论商汤有几个亳都，汤之所迁在山东者有亳都。

《左传》定公六年，阳虎“盟国人于亳社”，哀公四年鲁“亳社灾”，丁山据此认为“亳社在鲁，可见鲁国在殷商时代也有亳称了。”“薄姑，应该是亳社的音讹。”^⑥陈梦家考证甲骨卜辞所见都邑和征伐方国，认为商殷区域“东至于黄海、渤海”。“自殷庚以来的殷代，商王国的主要范围在河南；在此之前，商的活动范围偏于山东省。”^⑦所以，今山东地区有殷商都城是可信的。由于文献缺失，无法确证薄姑为亳社的音转，但亳和薄姑之薄韵部相同不可否认，这意味着亳和薄姑有联系。

《尚书》、《尚书大传》、《书序》、《史记·周本纪》、《汉书·地理志》皆载：周成王伐奄之后，“迁其君薄姑”。无论将薄姑理解为奄君之名而迁往齐地，还是将奄君迁往齐地之薄姑，总之，在战败之后，奄人中的一部分被周成王迁徙到齐地，这便是史书记载的“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⑧之本事，即齐地商奄人的由来。从此，薄姑一带有了奄人踪迹，这是泰山南北、齐鲁两国有奄人活动最原始的、最明晰的记载。齐鲁都出现和奄人有关的历史地名、遗址及民族传说也就不足为奇。

① 《史记》卷3《殷本纪》，第93页。

②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7，《十三经注疏》，第158页下。

③ 《逸周书》卷9《殷祝解》，黄怀信等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13页。

④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7，《十三经注疏》，第232页上。

⑤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

⑥ 丁山《盘庚迁殷以前商族踪迹之追寻》，《商周史料考证》，第25页。

⑦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11页。

⑧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59页。

(三) 商奄、薄姑与群羸毗邻而居

上古民族往往聚族而居，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集在同一区域或相邻区域共同生活。聚族而居使氏族有了可以依托的文化背景，礼乐文明也得以在此基础上产生。故而从居住区域考察民族的源流便成为现实的选择。按照这样的思考路径考察商奄及其分支薄姑的生活地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定商奄的族源。

《汉书·地理志》“琅琊郡”有县“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莽曰‘季睦’”。注引应劭语曰：“《左氏传》曰‘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①《汉书》所谓琅琊郡的姑幕，在今天山东东南部的潍水流域。“薄姑故城”实际上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在今天临淄市北部。故薄姑亦可称姑幕。姑幕和古郚地、古盖地都有关系。《元和郡县志》谓“沂水县，本汉东莞县，即春秋莒、鲁所争之郚邑也。城阳姑幕县南有员亭，即郚也……（隋开皇）十六年又于古盖城别置东安县，而此改名沂水县。”^②《山东通志》“沂水县”自注曰“沂水出沂山，东迳盖县故城。”书中述沂水县历史沿革曰“周为鲁郚邑地，后入于齐，秦属琅邪郡。汉置东安县，属城阳郡。东汉属琅邪国。”^③沂水东流所经盖县故城便是阎若璩所说齐地的齐下邑之盖，疑其为《左传》所谓的莱芜县的“弇中”。

鲁成公四年冬，“城郚”。《正义》：“《释例·土地名》‘鲁有二郚。’文十二年城诸及郚。杜云‘此东郚，莒鲁所争者。城阳姑幕县南有员亭，或曰郚即员也’。成十六年传‘晋人执季文子，公待于郚’。杜云‘此西郚。昭公所出居者，东郡廩丘县东有郚城，然则此为公欲叛晋故城郚以为备，当西郚也。’”^④“郚”，《公羊传》作“运”。罗泌认为“运：京相璠云：廩丘东八十有运城。廩丘，随（隋）并入郚城，今隶济。”^⑤有关郚城县的变迁，《山东通志》记述颇详“周为鲁郚邑。秦属碭郡。汉为廩邱县，地属东郡。东汉属济阴郡。晋属濮阳国。北魏属濮阳郡。隋改曰郚城，属东平郡。”^⑥春秋时之郚有东郚和西郚，西郚在鲁西邑，即今郚城；东郚在鲁东，即沂水县。

罗泌《路史》曰“掩，即奄，郚也。尧之仙源故曲阜有奄城、奄里、古之弇中。（《郡国志》奄城，古奄国。茂先云《史记》出鲁弇中）自运迁掩，故史有运

① 《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87页。

②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1《河南道》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4页。

③ 《山东通志》卷3《建置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9册，第192页下—193页上。

④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6，《十三经注疏》，第1901页中。

⑤ 罗泌《路史》卷25《国名纪》乙，《四库备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44册，第331页下。

⑥ 《山东通志》卷3《建置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9册，第198页下。

掩氏，鲁近淮夷，武王伐之。（《唐韵》郟，国名，商奄也。祝佗曰：因商奄之民以命伯禽）^①“兖之仙源”即兖州的仙源县。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改曲阜县为仙源县。运掩氏便是司马迁所谓嬴姓的“运奄氏”，《潜夫论》亦作“运掩氏”。运掩氏便是由郟地迁往奄地的嬴姓族群，也是嬴姓的一支。运掩氏分布在鲁国东部的东郟，即沂水县属地，“盖县故城”又在沂水县，同时又是薄姑古族的居住地，与相近的郟城，都是少皞氏之墟，这一地域就是少皞氏族裔嬴姓的聚居地。

《逸周书·作雒解》谓“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②《孟子》则曰“灭国者五十”，不知孰是。春秋末期，这些嬴姓小国所剩无几。如隐公元年，莒人入向。杜注“莒国，今城阳莒县。”《正义》曰“《谱》云‘莒，嬴姓，少昊之后。’”庄公十九年，楚大夫鬻拳伐黄。杜注“黄，嬴姓国，今弋阳县。”宣公四年，宣公及齐侯“平莒及郟”。郟是典型的嬴姓，莒，杜《谱》作嬴姓。昭公元年，赵孟云“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③虽然众多嬴姓国逐渐被灭亡，但文献上还是留下诸多痕迹，可供稽索。《国语·郑语》谓“嬴，伯翳之后也。”韦昭注“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后伯益也。”^④《说文》：“嬴，少昊氏之姓。”伯益之后即为嬴姓，徐、郟、莒、黄、江等国亦少皞氏之裔。从分布地域看，这些嬴姓国恰在东方，大略分布在山东西部、河北东南部、河南东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只有嬴秦偏居西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综上所述，奄或曰商奄是南庚东迁时都城所在，其民是殷商余绪，其国是商王所封诸侯国，生活在山东曲阜一带（少皞氏之墟）。商末周初，奄国在诸嬴姓诸侯国中实力最为强大。三监、禄父及商奄、徐等部族叛周，被周公及成王征伐，商奄的一部被迁徙到周人西陲，由“东夷”变成“西戎”。

二、嬴秦的民族来源

《史记·秦本纪》：伯益姓嬴氏，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说明嬴姓分布较广。《公羊传》明确认为“秦者，夷也。”出土文献中，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提及秦人祖先来自东方。李学勤认为“苏秦谓燕王章”之“‘秦将不出商阊（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所说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⑤清华简《系年》记载，充分证明秦之祖先生活

① 罗泌《路史》卷25《国名纪》乙，《四库备要》，第44册，第331页下。

② 《逸周书》卷5《作雒解》，第553页。

③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41，《十三经注疏》，第2021页上。

④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郑语》，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69页。

⑤ 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

在东方。

（一）嬴秦是东夷民族，少皞氏之裔

东夷部族多以鸟为图腾，其中一部甚至被称为鸟夷。《尚书·禹贡》：“岛夷皮服。”《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五帝德》、《汉书·地理志》均作“鸟夷”。《书传》：“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孔颖达疏“郑玄云‘鸟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王肃云‘鸟夷，东北夷，国名也。’”^①可见，东夷之中有被称为鸟夷的一系族群存在。《山海经》有鸟氏、羽民国、卵民之国，这些文献记载恐怕是卵生神话最原始的记录，既是图腾崇拜，更是先民质朴的信仰。

童书业谓“古代冀、扬二州有鸟夷（据《禹贡》），淮水流域有佳夷（见甲骨文，即淮夷），《说文·佳部》：‘佳，鸟之短尾总名也。’是佳夷犹鸟夷也。”又云：“沿海至淮水凡渤海湾一带，古代民族皆以鸟为图腾，商人则其大长也。貉族中之夫余、高句丽其传说之始祖亦系卵生者，盖亦奉鸟为图腾之民族，是殷及东夷貉族皆同一大族下之分支耳。”^②商人是奉鸟为图腾的民族，因其建立强大国家，创造灿烂文明，颇受世人关注。

东夷少皞集团，也是典型的鸟崇拜之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③少皞氏族群中，有以各种禽鸟为徽识的小族团。根据司分的“玄鸟氏”这一文献线索，曹定云认为“商族原本是‘少皞’部落中的‘玄鸟’氏族。”^④简而言之，“玄鸟”是殷商族群文明的历史起点。

《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郑笺“雎鸠，王雎也，鸟摯而有别。”“摯本亦作鷩。”^⑤郯子所云“吾祖”、“我高祖”少皞摯即少皞鷩，是一种凶猛的禽鸟。只有像鷩那样凶猛的禽鸟才能够传达出王霸之气，震慑并统领整个族群。对此，袁珂有深入论述“‘纪于鸟’而以鸟名官之说，自是神话之历史化。推寻其本貌，当即少昊在东海所建立之鸟国，以鸟名官之，诸官实皆鸟也。少昊名摯，古摯、鷩通（《史记·白圭传》：‘趋时若猛兽摯鸟之发。’摯鸟即鷩鸟也，可证），则为此百鸟之王而名‘摯’之少昊，神话中其亦鷩鸟之

①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6，《十三经注疏》，第147页上。

② 童书业《四裔民族》，《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8页。

③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48，《十三经注疏》，第2083页中—2084页上。

④ 曹定云《商族渊源考》，《中国商文化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

⑤ 孔颖达《毛诗注疏》卷1，《十三经注疏》，第273页。

属乎!”^① 在古史传说时代,少皞氏的故实并不显著,在周、秦及汉初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除上文所引昭公十七年郑子之语,昭公二十九年记五行之官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② 《国语·楚语》观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国语》亦谓《春秋外传》,春秋时记其事者仅限于此。唯《山海经》每每提及。

《汉书·律历志》曰:“《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摯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③ 《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嫫祖,生玄器,即青阳。显然,班固认为少昊清即青阳玄器,由此少昊变成了黄帝的儿子。东汉时,少昊为黄帝之子的说法恐怕不甚确定,至少是半信半疑的,从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力图证成此事可以看出这点。“《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昊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④ 张衡所云《周书》,即为《逸周书》,又云《汲冢周书》。该书卷六《尝麦解》曰:“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黄怀信汇校曰:“请,诸本作‘清’。”^⑤ 可知张衡所云不谬。前修未密,后起转精。陆德明《尚书音义》认为:“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阳,一曰玄器,己姓,黄帝之子,母曰女节,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⑥

上述材料说明,少昊摯是黄帝的裔子,即将少昊氏纳入大一统帝系之中。其远期思想渊源于历史统一思想的作祟,近期的精要所指在于阐释政治意图。东汉贾逵上疏曰:“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少昊代黄帝,即图讖所谓帝宣也。”^⑦ 这里明显存在着对司马迁的不满,表现出强烈的古史正谬意图,同时也深为后人所接受。《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郭璞认为:“‘孺’义未详。”后儒释经,“孺”字出现“养育”和“类属”之义。以“属”解“少昊孺帝颛顼”之“孺”颇显迂曲,清人吴任臣注《山海经》谓:“杨慎补注曰:‘孺谓长育之也。’”^⑧ 实为得其精髓。郝懿行详考诸家文献,调和异说,其《山海经笺疏》曰:“此言少昊孺养帝颛顼于此……少昊即颛顼之世父,颛顼是其犹子。世父就国,犹

①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38—339页。

②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53,《十三经注疏》,第2124页上一中。

③ 《汉书》卷21下《律历志》下,第1012页。

④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54,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61页。

⑤ 《逸周书》卷6《尝麦解》,第784页。

⑥ 孔颖达《尚书注疏》,“书序”,《十三经注疏》,第113页下。

⑦ 《后汉书》卷36《贾逵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7页。

⑧ 《山海经广注》卷14《大荒东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第213页下。

子随侍，眷彼童幼，娱以琴瑟，蒙养攸基，此事理之平，无足异者。”^①袁珂《山海经校注》采用郝懿行观点，以为释“孺养”无问题，“少皞即颛顼之世父，颛顼是其犹子”^②大致可信。

昌意与青阳皆为黄帝正妃嫫祖所生。如果少皞摯即青阳玄器，被视为黄帝之孙的颛顼即为少皞的子侄辈，那么“少昊孺帝颛顼”便可以理解。《帝王世纪》恰好按着这个思路记述颛顼和少皞的关系。“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女枢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父昌意虽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为诸侯。及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③少皞氏衰落，九黎乱德，二十岁的颛顼受命为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国语·楚语》），民神异业，恢复常典。以此观之，以颛顼为东夷之民，鸟崇拜之属，是有说服力的。

需要说明的是，传世文献将少皞氏纳入黄帝族群，虽有大一统政治的影响因素，但民族融合的成分也不能排除在外。少皞氏和颛顼是否是世父和犹子的关系也不会像文献记载的那么简单。《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显然，颛顼是风姓，是太皞的族裔。风在甲骨文中作“凤”。太皞又作太昊，即和太阳崇拜有关，而太阳中有三足鸟的形象，意味着太阳崇拜和鸟崇拜有必然的联系。一方面，相对于太皞而言，少皞又称小皞，二者生活地域犬牙交错、重叠混杂，从东夷族群鸟崇拜的文化意义讲，少皞氏和颛顼为同一族群；另一方面，商奄嬴姓也没有疑问，是少皞的后裔也不存在问题，因而《史记·秦本纪》开篇即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系年》为我们提供了少皞、颛顼、嬴秦是同一族群的确凿的证据。

（二）伯益、契、摯是东夷始祖神话分化的结果

《吕氏春秋·音初》：“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谿谿。”“谿谿”即“嗒嗒”，鸟鸣之声。《说文解字》：“乙，鸟也。齐鲁谓之乙，取其鸣自呼，象形。”燕之“其鸣自呼”即为“乙乙”、“嗒嗒”，又似《史记》言宝鸡神所至“其声殷云”之“殷殷”。齐鲁人根据燕子鸣叫特点，呼之为馵；其颜色黑，所以又称为玄鸟。“玄鸟陨卵”即燕之遗卵明矣。故杨宽撰文

①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14《大荒东经》，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434页。

②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339页。

③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11《帝王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212页。

认为“燕‘取其鸣自呼’则为‘乙乙’，‘乙乙’当即‘嗒嗒’，则益之即燕。”^①又云“凤鸟即玄鸟，玄鸟即燕，燕又即益，则句芒亦即益。”^②同时，申之曰：秦人始祖“益之传说，出于‘燕’之神话，故其祖先为玄鸟（其妻姚姓之玉女，当亦即有娥之佚女），其后裔为鸟俗氏而鸟身人言”。^③此论不啻抓住秦人族源问题的关键，深入论题的精髓。

商奄的“奄”，运掩氏的“掩”，和嬴、偃有内在联系。刘师培论曰：“舜以嬴姓赐益，亦以少皞旧姓赐之耳。皋陶为益父，故姓与益同。嬴姓转偃……则嬴、偃同字明矣。”又曰：“徐为嬴姓，而徐有偃王，偃亦嬴姓之嬴。”^④徐旭生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偃、嬴同字”。^⑤如果偃即嬴，从音韵角度看，奄，或者郟、偃，以及嬴，都和伯益有关，即和玄鸟、燕子（𪚩）发生关联。而奄、郟、偃、燕、嬴、𪚩皆为一声之转。林剑鸣关于“嬴”、“燕”的讨论，深化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原来‘嬴’姓与秦人对玄鸟的图腾崇拜有关，玄鸟就是燕，而据刘节先生研究‘燕、嬴实为同类双声’，刘先生这里提出的‘嬴’就是‘嬴’，从他文章的引文中就可证明……所以‘嬴’也就是‘燕’，嬴姓即燕姓。”^⑥从玄鸟的角度研究“奄”、“嬴”、“燕”的音义取向问题，启人深思。

少皞氏以凤鸟名官，《尔雅·释鸟》：“鷩，凤，其雌皇。”^⑦宋人陆佃曰：“凤，鸟之美者，能君其类而知时……又龙乘云，凤乘风，故谓之‘鷩’。鷩，偃也。亦鸟偃服焉。”^⑧也就是说，凤凰能统领鸟类，能够乘风飞翔，众鸟宾服，故为鷩。鷩，偃也。偃，伏也，众鸟偃服之意。在这一意义上，少皞氏以凤鸟名官，不仅增加了新的内涵，也使我们对少皞摯和偃、嬴、奄关系的理解递进一层。

《史记·殷本纪》载：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即《诗经·玄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本事，主人公是商始祖契。《尚书》帝命契“作司徒”。^⑨《国语·周语下》：“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① 杨宽 《伯益、句芒与九凤、玄鸟》，《杨宽古史论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8页。

② 杨宽 《玄鸟、凤鸟、九凤与句芒即益》，《杨宽古史论文选》，第302页。

③ 杨宽 《伯益、句芒与九凤、玄鸟》，《杨宽古史论文选》，第299页。

④ 刘师培 《偃姓即嬴姓说》，《左庵文集》卷5，北京修绶堂本。

⑤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⑥ 林剑鸣 《秦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⑦ 邢昺 《尔雅注疏》卷10，《十三经注疏》，第2648页下。

⑧ 陆佃 《埤雅》卷8《释鸟》，王敏红点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⑨ 孔颖达 《尚书正义》卷3，《十三经注疏》，第130页。

韦昭注“玄王，契也。殷祖契由玄鸟而生，汤亦水德，故曰玄王。”^①《荀子·成相篇》亦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②从《尚书》到《荀子》，契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又称“玄王”，即《诗经·商颂·长发》所谓的“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作为商人后裔的孔子，在《纬书》中被称为玄圣、玄丘、墨孔，其文献来源大概本于此。

嬴秦祖先颛顼是少皞的犹子，都为崇尚鸟图腾的玄鸟一族。那么，嬴秦“玄鸟陨卵”生人与“玄鸟生商”二者有无联系？实际上，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郭沫若便认为“少昊金天氏帝挚，其实当即是契。古挚、契同部。挚之母常仪，契之母简狄，实系一人。”^③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这一研究路向被很多学者肯定和接受，研究成果很多。胡厚宣曾进一步申之曰“正以少皞即契，所以才有契作书契之说。”^④童书业也讨论了少皞与契的关系，认为“《路史》注董氏《钱谱》引《世本》：‘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字青阳。’《潜夫论·五德志》：‘少皞……是始作书契。’则少皞即契，实一传说之分化。”^⑤对此，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也有精彩分析“卜辞‘帝于东方曰析’，《大荒东经》说‘东方曰折’。挚、折、析是一，则卜辞东方之帝曰析即少皞之挚或质。”^⑥陈梦家甚至认为契就是商的始祖，甲骨卜辞中的王亥。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陈梦家论及王亥故事，涉及顾颉刚及王闳运的观点，二人均认为王亥是少皞氏四叔的该，将秦人和商人的祖先联系在一起。

秦人“女修吞卵”和殷人“玄鸟生商”的神话，显然是鸟崇拜意识下的故事结构，有着共同的心理和文化基础。秦人之祖少皞挚和商人之祖契，存在同一神话不同表述的情况。钩稽文献，二者所具有的巧合和相似性，无不说明挚和契是同一人。退一步说，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秦人和商人有着相同的祖先，有同一族源的结论。在没有其他材料支撑的情况下，梳理传世文献得出的这一结论，显得单薄而缺乏说服力。清华简《系年》告诉我们，秦人是商奄后裔，传世文献确证商奄是殷商支族，从而可以肯定秦人就是殷商人的后裔。

（三）嬴秦礼俗的东方情结

传统观念认为，五行学说发生于战国中、晚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最有说服

①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3《周语下》韦昭注，第131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8《成相篇》，诸子集成本，第308页。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51页。

④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4页。

⑤ 童书业《少皞与契》，《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第351页。

⑥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40页。

力的依据。考察秦人的祭祀传统，这样的结论很难让人信服。在五行系统中，配祀西方主宰神“白招拒”的五行帝是少皞氏，少皞氏原本在东方，何以成为西方之神，并且为秦人所虔诚祭祀，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晓解。

《周礼·天官·太宰》有“祀五帝”的职责。郑司农云“五帝五色之帝。”贾公彦疏“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①“白招拒”是西方的主宰神，与之配食的是少皞。《礼记·月令》所祭四时之帝：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此为五行之帝。配以五人帝即伏羲、神农、轩辕、金天、高阳。加之以四方，应之以五色，就是西方白色帝白招拒，金天氏少皞配食。少皞氏之墟在曲阜，少皞氏是东方族群。

《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系年》未出现时，以上记载不得甚解。《系年》的出现，使秦人东来说问题迎刃而解。西周末，秦襄公率兵救周幽王之难，又以兵护送周平王东徙洛阳，被封为诸侯，祭祀成为立国的首要问题。“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②从“自以为”可知，秦人是知道自己历史的，所祭祀的主神或说始祖神就是少皞氏，东方民族之神一跃为西方之神，秦人迁徙痕迹清晰可见。祠白帝少皞氏几乎成为数代秦人的大典。“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于是作鄠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司马迁说“自未作鄠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秦历十余国君后，至秦献公十八年，栎阳雨金，献公自以为得金瑞，作畦畤来祭祀白帝。秦人祭祀白帝，被称为白帝的子孙，在诸侯及民间广为流传。《史记·封禅书》：“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③高祖斩杀白蛇起义的故事是在为秦亡汉兴张本，由此透露出秦人主祀白帝少皞氏强大的文化惯性。

东周初，秦人就祭祀白帝，祭祀西方之神少皞氏，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支撑的五帝说，最迟也是在这一时期呈现了雏形，或者已经完备。纵观春秋时代，还没有哪个诸侯国像秦国那样，大张旗鼓地倡导已经属于五行系统的帝神祭祀。阴阳五行学说和商人的关系，也因为秦之先祖由东向西的迁徙，变得更加有据可查，必将成为今后研究的新课题。

《封禅书》：“作鄠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④一块陨石惊动山坡上夜宿的野鸡，“其声殷云”，或者说是野鸡夜鸣，秦文公以为得雉鸣之瑞，于是建祠祀之。苏秉琦认为“所不可解者，在古代社会中祭祀是

① 贾公彦《周礼注疏》卷2，《十三经注疏》，第649页。

②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17，《十三经注疏》，第1832页。

③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59、1378页。

④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59页。

与战争同样重要的第一等大事，何以秦人把它（陈宝）看得如此重要，竟与祭天之典不相上下？及秦兼并天下后，尚唯雍四时上帝为尊，而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汉书·郊祀志上》）。一个自然的解释，便是在此平易故事的背后，恐尚含有在秦人社会中某种原始的习俗信仰。”^① 此论甚为精要。且不说野雉“殷云”代表上天意志，野雉即为鸟属，鸟崇拜的民族文化心理表露无遗。我们知道，野雉之鸣还惊动了殷帝武丁。《史记·殷本纪》载“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鸣，武丁惧”，^② 然后修政行德，殷道复兴。殷民族具有典型的鸟崇拜情结，玄鸟生商的历史殷人耳熟能详。野雉鼎鸣代表着上天意志，也代表着祖先神谕，所以武丁惊恐万状。秦人先祖和商人祖先都对鸟的光临表达了崇高礼敬，反映他们文化心理和宗教趋向的一致性。

陕甘一带出土的“亚罍罐”族徽形状为亚字形外框，内有一鸟，鸟下有一物。邹衡认为“其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善于捕鸟（或从丁山广其义为捕鸟兽）的氏族。古者以官职为氏，那末，此氏族中必定会有一个善于捕鸟（或鸟兽）的祖先，曾经充任过商朝或其以前的鸟（或鸟兽）官，而他的子孙又住在今陕西、甘肃一带的先周文化地域内。说至此，人们将不难把这个氏族和秦的祖先联系起来。”^③ 秦人祖先有鸟生神话，伯益以玄鸟自呼而取名，嬴秦有“鸟俗氏”，蜚廉玄孙“鸟身人言”，等等，无不与出土文献相合，证明了秦人和鸟图腾的关系。捕鸟氏族，不能不让人想起《山海经》中的王亥。“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大荒东经》）这个食鸟的王亥便是殷人先祖，《史记·殷本纪》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世本·作篇》作胙，《大戴礼记·帝系篇》作核，《楚辞·天问》作该，《吕氏春秋·勿躬篇》作王冰，王国维认为“实系一人”。^④ 甲骨文中，亥就是一只鸟的形象。陈梦家认为：王亥之亥是一种鸟名，“王亥捕鸟而食，牧夫牛羊，则其从事佃猎与初为畜牧，是很显然的。”^⑤ 晚商青铜器《玄鸟妇壶》的“玄鸟妇”也与“亚罍罐”的族徽遥相呼应。可见，秦、商出土文献以及传世典籍的相互印证、相互重叠绝非巧合，而是一种同种同质文化的体现。

另外，河南省安阳的商王陵墓，有“亚字形墓”和“中字形墓”。亚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亚形族徽与殷天子的亚字形陵墓形制有无关联，我们尚无从判断，但是其他如“墓壁、殉葬等方面，秦墓与殷墓也有惊人的类似之处”，^⑥ 林剑鸣依此认为秦人祖先与殷

① 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页。

② 《史记》卷3《殷本纪》，第103页。

③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28页。

④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9，第409页。

⑤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39页。

⑥ 林剑鸣《秦史稿》，第15页。

人祖先同属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此结论值得肯定。周婧峰、周春茂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比较陕西临潼零口村遗址战国秦墓中人骨与殷墟中小墓 2 组及 3 组的颅骨，得出“秦人亦可能源于东方，这个结论与‘东来说’相符”^①的结论。这种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和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秦人、商人同属于东方鸟夷，具有相同的玄鸟生人故事流传。从民俗学、神话学以及文献学的角度来分析，皆为一个传说的不同分化，即经过多次演化而逐渐变形，无论是玄鸟生商，还是女修吞卵生人，其本源皆可追溯到少皞氏。所以出现少皞挚可以是契、伯益也可以是契的多种神话构型。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证明，秦人和商人是同一族群，这是让人注意的。秦人僻居在泾渭之间，立为诸侯，祭祀的始祖神就是少皞氏，从礼俗学角度印证了秦人西迁。秦人的鸟崇拜情结以及人类学表征，则昭示了秦人东夷的文化特征。

三、嬴秦先祖的文化遗迹及迁徙路线

被迫迁徙到苦寒的周人西部边陲生活的嬴秦，其先祖东夷地域的生存状态已经不可考，而生存痕迹无法磨灭。这些生活痕迹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即便是游居不定，在某种历史条件下的记忆苏醒，也是旧日生活的影照。考察嬴秦先祖原初的生活地域以及迁徙的行进路程，对于了解秦人的民族形成有重要帮助。

（一）齐鲁之秦、嬴：部族的初源地

中国先民有一种习俗，即某一氏族、部落或封国在由某地迁徙到其他地域时，经常以原居住地的城邑、山川命名新生活区域的山川及所建造的城池。非子将复祀嬴氏所建的城邑命名为秦，不会是臆造的。嬴秦既然是东夷民族，就一定会留下生活过的痕迹。

在今山东省西部区域，春秋时尚有秦城存在。《春秋》鲁庄公三十一年秋，筑台于秦。杜注“东平范县西北有秦亭。”^②《水经注》：“瓠河自运城东北迳范县与济濮枝渠合，故渠上承济渎于乘氏县，北迳范县，左纳瓠渎，故经有济渠之称。又北与将渠合，渠受河于范县西北，东南迳秦亭南，杜预释地曰‘东平范县西北有秦亭’者也。”^③运城一带是嬴姓运奄氏的居住地，秦城恰恰也在这一区域，这恐怕不能用简单的巧合予以解释。

属羌钟于 1928 年至 1931 年在洛阳故城遗址出土，一套十四件，原藏刘体智，

^① 周婧峰、周春茂 《秦人族源之人类学信息》，《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6 期。

^②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卷 10，《十三经注疏》，第 1783 页上。

^③ 《水经注》卷 24 《瓠子河注》，第 576 页。

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及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其钟之第5件铭文有“唯廿又再祀，虘羌作戎，厥辟韩宗，辄率征秦，迺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倭恃力，袭夺楚京，赏于韩宗”，亦出现“秦”的记载。吴其昌说“东击齐，又何以欲同时西征秦耶？且征秦何以反东向入齐长城而会于平阴耶？曰：此秦非陕西之秦，乃山东齐鲁之交之秦也。齐鲁之交亦有‘秦’地，故《左传》记鲁大夫庄公九年有‘秦子’，襄公十年有‘秦堇父’、‘秦丕兹’，昭公二十五年有‘秦遄’，又孔子弟子有‘秦商’，皆此齐鲁之交，秦地之人也。又《春秋》经庄公三十一年，‘秋，筑台于秦。’杜注‘东平范县西北有秦亭’，是其地也。”^① 据此，山东的齐鲁之间有“秦”是无法否认的。

《春秋》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赢。”此之赢，即“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赢”之赢，也是灌婴打败田横之“赢下”。《左传》杜注“赢，齐邑，今泰山赢县。”^② 《史记集解》：“晋灼曰：‘泰山赢县也。’”《史记正义》以为：“故赢城在兖州博城县东北百里。”^③ 《汉书·地理志》谓：泰山郡有赢县。^④ 《后汉书·地理志》载“赢有铁山”。春秋时期，赢是齐鲁交界地区齐国的一个城邑。

关于赢县历史沿革，清人《山东通志》记“赢城在县西北四十里，即赢邑。汉置县，属泰山郡。《水经》‘汶水出莱芜县原山西南，过赢县南’是也。《郦注》系‘赢县故城’……故县镇是《县志》所载之古博城，盖古赢城也。《经》称赢县，即此。”^⑤ 赢邑，或曰赢城，或曰赢县，在齐鲁交界处大抵不错。赢邑因赢水而得名。郑樵认为：赢是“因义借音”，“赢秦姓也，以其所居，故为赢水之赢”。^⑥ 又云“赢，地名也。杜预云‘泰山赢县’。唐并入兖州博城，博城今为奉符，以所居于赢，故因生以姓。或言，河间有赢水，故为瀛州，即赢姓所居之地。”^⑦ 赢邑筑于赢水岸边或左近赢水而得名赢，又是赢姓氏族的聚居之地。

瀛洲、蓬莱、方丈是传说中的东海三座仙山。瀛洲在渤海之中，当为鸟夷（岛夷）居住地。童书业以为“《禹贡》作时东方沿海一带尚有以鸟为图腾之部族，盖古时东方各族本多以鸟为图腾也。”^⑧ 海中仙山即瀛洲的居民，或为赢姓东夷人所居之岛屿，故谓瀛洲。其后，历史上确实出现瀛州县的设置。《魏书·地形志》载：襄垣郡下辖四个县，其中有瀛州县。“瀛州，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间、高阳，冀州

① 吴其昌《虘羌钟补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5卷6号，1931年，第48页。

②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6，《十三经注疏》，第1746页上。

③ 《史记》卷94《田儋列传》，第2647页。

④ 参见《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82页。

⑤ 《山东通志》卷9《泰安府·莱芜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92页下。

⑥ 《六书略》第4，《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28页。

⑦ 《氏族略》第3，《通志二十略》，第105页。

⑧ 童书业《鸟夷》，《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第355页。

章武、浮阳置，治赵都军城。”^①《史记·张仪列传》称，张仪说赵武灵，“割河间以事秦”。《正义》曰“河间，瀛州县。”^②瀛州恰恰设置在赵国的故地上。由此可知，传说中的海上瀛洲和后魏在战国之嬴赵故地设置的瀛州县，皆与嬴姓有关。

秦、嬴出现在山东地域并不奇怪，其所在的区域恰恰是少皞氏后裔嬴姓的聚居地，即少皞之墟。由于王朝嬗递，嬴姓诸侯国代兴代湮，其本身承载的文化逐渐磨蚀、消解，真相也就愈加模糊不清。

（二）商西陲与霍太山：嬴秦先祖的封国所在

秦之先祖原本生活在山东的嬴或秦一带，和其他嬴姓族群，如郟、莒等比邻而居。伯益佐禹治水，子孙入夏为官，迁徙居地，这样才出现“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的情况。“夷狄”是“中国”的对称，泛指非“中国”之族群。相对夏人来说，伯益的子孙首先应该在夷，其次才是华，商以后才迁徙到西方而被视为戎狄。“自太戊以下，仲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③所谓“多显”的嬴姓诸侯国，就是周初蜚廉往依的奄、徐、黄、江等参与禄父叛周的东方夷国，也就是《作雒解》所谓“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的大部分嬴姓诸侯国。

《史记·秦本纪》：“（仲衍）玄孙曰中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死，遂葬于霍太山。”^④“在西戎，保西垂”，苏辙《古史》卷六之《秦本纪》作“中湏在商戎，保西垂”。说明商人西陲之地有嬴姓的足迹，尤其是霍太山，蜚廉死葬于此，其地对于嬴姓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对于西垂的理解，历来歧说纷纭。王国维《秦都邑考》认为“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⑤郭沫若也以为西垂“乃指西部边陲”。这是不错的。中湏及其子孙有“在西戎，保西垂”的能力，亦或曰这一支系以武力见长，“恶来有力，蜚廉善走”可窥其一斑。但是无论西垂是西部边界，还是固化为地名，我们必须明确，此之“保西垂”是殷商的西垂，所以有必要了解商代的西部边界在何处。

殷商人征伐或曰势力所及的范围主要是中原地区。很多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在研究大量甲骨卜辞，考察卜辞中所见的殷人都邑及征伐的方国之后，陈梦家确定殷商势力范围“北约在纬度40°以南易水流域及其平原，南约在纬度33°以北淮水流域与淮阳山脉，西不过经度112°在太行山脉与伏牛山脉之东，东至于黄海、

① 《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9页。

② 《史记》卷70《张仪列传》，第2295页。

③ 《史记》卷5《秦本纪》，第174页。

④ 《史记》卷5《秦本纪》，第174页。

⑤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第529页。

渤海。”^① 该区域相当于今山东、河北、河南及安徽、江苏两省的北部，“大约晚商时代，商王国的势力已逾太行山而西”。陈氏的结论非常谨慎，也非常有说服力。童书业的结论是“商之疆域，盖不出今河南省之北半部，山东省之西半部，江苏、安徽二省之北部，山西、河北二省之南部以及陕西省之东部。”^② 就商人的西部而言，在陕西东部和山西西部即吕梁山和伏牛山一线大抵不错。中澆所保殷之西陲，便在这一线以西。

《史记·秦本纪》载，周穆王西巡狩，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王御，一日千里，而有功平叛。周穆王以赵城封造父，子孙因以为赵氏。张守节又引《括地志》云：“赵城，今晋州赵城县是。本彘县地，后改曰永安，即造父之邑也。”^③ 周穆王为什么将造父封在赵城，这是我们必须厘清的问题。

蜚廉葬于霍太山。《史记索隐》：“岳，太岳，即冀州之镇霍太山也。按《地理志》：‘霍太山在河东彘县东’。”^④ 《周礼》称为霍山。^⑤ 显然，霍太山即霍山，又称太岳。《水经注》谓“汾水又南，与彘水合，水出东北太岳山，《禹贡》所谓岳阳也，即霍太山矣。上有飞廉墓。”^⑥ 飞廉即蜚廉，系赵氏的嫡祖。《山西通志》卷十八《山川二》“平阳府”：“赵城县，霍山在县东北三十里。”^⑦ 霍太山与赵城相接，而彘县、赵城县、霍邑县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地名，治当为一地。治同一地域的，显然又加进汾西县。在清代，汾西县东二十里即为霍州界，东南七十里至赵城县。蜚廉死后葬所霍太山，造父所封赵城，都集中在今天山西南部、西南部的霍州、临汾一线，这和陈梦家所言晚商时代其势力已逾太行山而西，童书业之以为商之疆域西部在“山西、河北二省之南部以及陕西省之东部”的观点相合。中澆就在这一带为殷商保西陲。《大清一统志》之《平阳府志》：“澆水在临汾县北。有二源，一出襄陵县东南崇山，一出浮山县南龙角山，俱西北流，合澆水至临汾县北入汾水。”^⑧ 蜚廉的父亲名中澆，又在澆水一代为商保西陲，两者恐怕不无关系。另外，《路史·国名纪》载“非，蜚也，蜚廉国。龙门县南七里有蜚廉故城，非子祖也。又絳之正平蜚廉城，云事纣所居。”^⑨ 显然，蜚廉葬在霍太山系选择父亲当年的势力范围，或者说是中澆子孙的居住地之内，这也是蜚廉的封国所在地。蜚廉生季胜，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11页。

② 童书业《殷商之势力范围》，《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第11页。

③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第340—341页。

④ 《史记》卷2《夏本纪》，第53页注。

⑤ 贾公彦《周礼注疏》卷33，《十三经注疏》，第863页。

⑥ 《水经注》卷6《汾水》，第161页。

⑦ 《山西通志》卷18《山川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2册，第579页下。

⑧ 《钦定大清一统志》卷99《平阳府》，《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6册，第61页上。

⑨ 罗泌《路史》卷25《国名纪》乙，《四库备要》，第44册，第331页上。

季胜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为蜚廉的五世孙。周穆王封造父于赵城，实际上是将祖先的故地还封于造父。

在商代，嬴秦先祖和商人的关系比较融洽，为商人保西垂；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或曰能力，周灭商前后，嬴族的一支又和周人拉起血缘关系，从而又为周人保西陲，于是出现申侯所言“我先邠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湣，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的情况。此之西垂则指周的西部边境，即泾渭之间的西犬丘。所以，在商末周初就有嬴族活动在甘肃甚至还要向西一带。周孝王分大骆嫡子名为成的封土给非子，令非子“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非子所筑秦邑，《集解》引徐广语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①《水经注》云：“（秦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②秦邑是非子所筑之城，却不是秦始迁之祖的居住地。

（三）朱圉与陇西之秦：秦人的历史发端

关于秦人的发端，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大骆、非子一系。然而，从清华简《系年》的记载来看，这一研究颇有不足。《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③恶来其后为秦，恶来本居东方，且为周公所戮，如何又西迁成为秦之祖呢？

恶来最早出现在《史记·殷本纪》，东汉王符以为“崇侯、恶来，天子之三公也”。^④恶来事纣，牧野之战被周文王所杀。蜚廉为纣出使北方，侥幸不死。后联合同姓国商奄、徐以及商王子禄父叛周，为周公所戮。由此可知，武王灭商后，蜚廉带着家族逃到商奄，其中包括恶来的儿子女防。周成王讨伐商奄，杀死蜚廉，又将蜚廉家族包括女防迁徙到邾吾。这便是《史记·赵世家》所言“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的由来。《史记·秦本纪》：“恶来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⑤恶来革者即恶来，“早死”实为被文王所杀。

商奄之民即女防最早迁徙到宗周西陲的邾吾。李学勤认为：邾吾“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圉’，在冀县南梧中

① 《史记》卷5《秦本纪》，第178页。

② 《水经注》卷17《渭水注》，第429页。

③ 《史记》卷43《赵世家》，第1779页。

④ 王符《潜夫论》，“论荣”，诸子集成本，第14页。

⑤ 《史记》卷5《秦本纪》，第174页。

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① 检阅《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条曰：“《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梧中聚。”^② 朱圉山由群山组成，只是各自称谓不同罢了。阎若璩亲登朱圉山，总结说“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谓‘朱圉山在伏羌县西南’最合。近遍征之，《通典》：‘天水郡上邽县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纪县有朱圉山’，‘岷州大潭县有朱圉山。’何朱圉之多也？说者遂谓，朱圉山连峰叠嶂，绵亘于伏羌县之西南，皆可以朱圉目之。”^③ 生活在这一片区域的蜚廉后裔是女防—旁皋—太几—大骆之支系，因为造父深得周王宠遇，也随造父姓赵氏。大骆娶申侯之女为妻，生嫡子成为嗣君。周孝王分割成的封地给大骆的庶子非子，使之筑城邑，“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偌大的朱圉山地区，属于台地，有渭水在山区和台地中穿行，非子在自己的封地上选择筑城地址，所筑之城名之为秦，恰是对于东方秦地的呼应。因为民族的迁徙，大多会在新的生活区以故土的城池山川所在地的地名而命名，这就是秦城的由来。

嬴姓的女防及族人西迁至朱圉，作为谪秦人而被称为秦夷，也承担起为周人保西陲的责任。朱圉山一带，有渭水流过，高山、河谷、台地及平原成为远来的秦夷人的生活区域。也正是在这一片区域，与戎狄犬错交居，相互侵扰，秦夷人不可避免地沾染戎狄之风，从而又被称为西戎。实际上，这时已有一部分嬴姓族群在甘肃一带为周人保西陲，即上文所说的中湫的后人，或可称为戎秦人。1959年6月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询簋》铭文中“先虎臣后庸：西门尸（夷）、毋尸（秦夷）、京尸（夷）……戎毋（秦）人”，^④ 其中“秦夷”和“戎秦人”尤其引人注意，研究者多不得甚解。李学勤认为“在金文方面，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戎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夷’，其作为戎边之人又可称‘戎秦人’。”^⑤ “戎”为我们揭开秦人东来而西居的历史谜团提供了钥匙。

商末周初抵达宗周西部的戎秦人和周公平定三监、禄父及商奄叛乱而西迁的“秦夷”，早已引起秦史研究者注意。虽然没有出土文献的支持，研究者还是得出比较中肯的结论“原来在殷商西陲的一部分秦人祖先，因西周占据了殷人统治地区，已被赶向更西的西周边陲。这时，又有被从东方迁来的部分嬴姓氏族，两部分加在一起，就成为最大的一股嬴姓氏族，他们被西周统治者赶向西方边陲，踏上了那遥远的、荒凉的黄土高原。这些人就是秦人的直接祖先。”^⑥ 需要说明的

① 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

②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12页。

③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6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67页。

④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第453页。

⑤ 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

⑥ 林剑鸣《秦史稿》，第19页。

是：第一，被迫迁徙到西周西部的商奄之嬴姓族群，或被安置在宗周的京畿地区或周边，以便控制。第二，如果商奄之嬴姓族群安置之地距离宗周过远，立足未稳，因无宗周的庇护，便有被戎狄歼灭的可能，从而失去长途迁徙的意义。当然，也有投奔夷狄的可能。第三，即是将商奄之嬴姓族群安置在周初攀姻亲而主动保西陲的嬴姓族人的居住地，或其西部边缘，两者即可互相保护，又有所牵制。林剑鸣所言的两部分合流，只有后者情况出现时才有可能。这样也就能够很好地解释甘陕一带，嬴秦居住的地名，如垂和西垂、犬丘和西犬丘等重复出现的问题。

殷商晚期，秦人先祖中湣已担当起为商“保西垂”的重任。中湣及其子蜚廉，孙恶来，所保之西陲在今山西西部及西南部，霍山的蜚廉墓、蜚廉国、赵城是嬴秦人在此生活过的重要遗迹。周人践奄之后，商奄故地及一部分奄民分封给伯禽；奄君及部分子民被迁徙到齐国蒲姑，令齐国管制起来；恶来的儿子女防及部分商奄之民，被周公远徙到天水的汧渭之间，与周初已到达这里的中湣子孙一起为周人保西陲，前者即为出土文献所说秦夷，后者即为戎秦人。女防和他的商奄之民，就是《清华简》所说的“秦先人”。女防的后裔逐渐强大起来，周孝王分割大骆嫡子封地与大骆庶子非子，筑秦邑，祀嬴氏，秦嬴从此为大夫，封诸侯，由扩地千里，最终统一中国。

秦与商都有关于始祖的玄鸟神话，伯益即商契，少皞挚也是商契等分析已可得到落实，因为嬴秦和商人本来就是同一族群，即同一氏族部落的分化。共同的始祖神话经过不同的变形而出现歧说，是在理论许可的认识范畴之内的。秦人祭祀少皞氏，是祭祀自己的始祖神，这已为《系年》所证实，也解释了东方氏族的始祖神少皞氏为何在阴阳五行系统中被确定为西方神的问题。五行学说的起源及相关问题，将有待于新的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辑：李红岩）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ot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dual attestation to recent research on excavated documents has far exceeded that in Wang Guowei's period. It is used both for an explanation and attestation of ancient history and for a suspic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unearthed materials and printed materials is more similar to Ku Chieh-kang's "only pursuing its changes." Therefore, the "prototype-meaning evolution theory" not only admits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have their "origins" or "prototypes," but also recognizes the distortions and twists arising from the inheritance, while trying to offer 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such evolution.

(8) The Discovery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Eastern Origin of the Qin Ethnicity" *Wang Hongjun* • 163 •

The ancestors of Qin were the Shanggai (Shangyan) people who were relegated by the Zhou people to the Shaanxi and Gansu region. Shangyan was originally the capital and then a "vassal state"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Shangyan people were of Shang ethnicity. The Shangyan people referred to themselves as the descendants of Shaohao, with the surname of Ying. When the Qin people worshipped Shaohao, they were worshipping their earliest ancestor. It was based on this kinship that the Shang official Feilian, along with Lufu and other Ying-surnamed states of Xu, Huang and Jiang, waged several rebellions against Zhou. After the rebellion in the Shangyan State was put down, the Zhou people conferred the land of Shangyan and some Shangyan people onto Boqin. The Shangyan emperor and some of his subjects were exiled to Pugu of the Qi state, under the care of Qi. The children of Elai and other Shangyan people were exiled to the area between Qian River and Wei River. They were the first comers during the earlier period of the Zhou dynasty. The descendants of Zhongyu who guarded the western border of Zhou were known as "Qin barbarians" in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the later-on Shangyan people were called "Shuqin people," namely the "ancestors of Qin"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When the Shangyan descendants became stronger, and when Emperor Xiao of the Zhou Dynasty granted some land of Daluo's heir son to Feizi, the Ying-surnamed Qin became the bureaucrat and then the vassal, and was granted thousands of miles of land. It finally unified China.